

理雅格英译《论语》中“仁”字物性角色分布

薛嘉琪

苏州大学, 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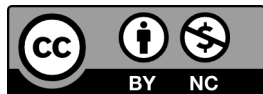
摘要 | 理雅格 (Legge) 是西方著名的传教士, 其对中国儒家哲学的识解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以理雅格英译《论语》为研究对象, 构建《论语》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仁”字的物性结构, 罗列“仁”字物性结构中物性角色分布情况。研究表明, 在理雅格英译《论语》中, “仁”字的评价角色出现次数最多, 且均为积极正面的评价内容, 这表明理雅格对中国儒家哲学具有一定的认可。但是, 物性角色中功用角色的缺失也反映了理雅格作为传教士来华宣传西方思想的任务。在此基础上, 本文尝试讨论了影响理雅格态度的因素, 以期为海外汉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并增强物性结构理论的应用性。

关键词 | 理雅格; 物性结构; 物性角色; 仁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引言

据《论语引得》统计,《论语》全文共 1.2 万余字, 其中“仁”出现了 109 次, 贯穿全文, 是《论语》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字。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一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古代, “仁”一直是人们所追求的最高道德和行为标准。如今, “仁”还是对人们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 人们以“成仁”为最终追求。在西方传教士理雅格的眼中, 儒家哲学核心“仁”的内涵是什么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有关理雅格英译《论语》中“仁”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策略领域。杨平 (2008) 通过总结分析数种翻译方法的利弊得失, 提出了“仁”最好是不译, 即用音译的观点。罗丹, 贾德江 (2011) 考

察了理雅格与辜鸿铭“仁”与“礼”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理氏译文为了忠实地再现原文, 采用异化翻译策略, 直译为主, 翻译态度严谨, 译文更具学术性, 但是可读性不强。王福祥, 徐庆利 (2013) 讨论了“仁”的不同翻译方式, 提出了以异化翻译策略为主, 以音译为主要翻译技巧, 同时, 辅以综合性注释, 进行概括性的诠释、补充与说明。

综上所述, 对于理雅格“仁”字英译的研究往往只停留在翻译策略论的层面, 仅仅讨论翻译策略的优劣, 提出可行的方法。然而, 作为翻译研究的中观环节, 翻译策略直接反应译者对于词汇本体的认识和理解, 构成由“体认”到“体悟”的认知体系。基于这样的认识, 本文拟以物性角色为理论基础, 考察理雅格英译《论语》中词汇本体“仁”字的物性角色分布, 以此来探究理雅格对“仁”的理解。

二、物性结构与物性角色

物性结构理论的哲学来源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Aristotle's four causes of knowledge): 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四因说”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他认为如果存在着有限的解释性条件和因素说明具体事物的产生和运动变化,都缘自上述四种原因。

哲学意义上的物性(Qualia),属于认识论的范畴,通常定义为“主观的意识体验”(Jackson, 1982: 127)。在语言研究中,物性结构(Qualia Structure)作为一种语言知识的表达平面,来源于生成词库理论。Pustejovsky (1991)将其定义为:词汇项目定义的对象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为了便于分析名词的意义,Pustejovsky (1995)将名词的物性角色分为四种:形式角色、构成角色、功用角色和施成角色。

形式角色:在一个更大的领域中辨认出一个物体的基础范畴,描写物体在更大的认知域中区别于其他物体的属性;

构成角色:描写一个物体和其各部分组成的关系;

功用角色:描写物体的用途和功能;

施成角色:涉及物体的来源或产生因素。

(Pustejovsky, 1995)

例如“书”这一物性,它是什么形状的(大书、小书),什么颜色的(红书、蓝书),由什么组成的(纸质书、电子书),有什么功能(读书、看书),怎么来的(写书、翻译书)。其中,“大”“小”“红”“蓝”构成“书”的形式角色;“纸质”“电子”是构成角色;“读”和“看”充当功用角色;“写”和“翻译”作为施成角色。

在此基础上,袁毓林(2014)又增加了六种名词物性角色,即单位角色、评价角色、材料角色、行为角色、处置角色和定位角色。扩充后的物性角色,由最初的四种变成了现在的十种。

纵观国内外,基于物性结构和物性角色的研究主要涉及复合词与特殊句式两个方面。在复合词研究中,Yumot (2010)利用物性结构探究日语中“V+N”复合词的语义特征。研究发现“V+N”复合词的语义中心不是由动词决定,而是由其名词决定。这一结论打破了先前以动词为中心理解复合词的模式。

Le Bruyn, De Swart, Zwarts (2010)发现在挪威语、加拿大语等语言中,介词总是被强加于“have-verbs”复合词,这使得词语间难以融合。而通过生成词库理论中的物性结构和论元结构的研究,他们认为“have-verbs”的复合词中,“have”本体就是理解复合词融合度(incorporation)的关键。

国内学者中,宋作艳(2016)考察了现代汉语双音节形名复合词的物性修饰关系,发现形语素有选择地约束名语素的不同物性角色。当形语素修饰名语素的形式角色或构成角色时,语义解读时常需要补充名词;当形语素修饰名语素的施成角色、功用角色或规约化属性时,语义解读时常需要补充动词。王恩旭,袁毓林(2018)考察了汉语中“颜+名”复合词的透明度。他们从复合词的物性角色分布着手研究,发现“颜+名”复合词的不透明度较高,且物性角色分布有规律可循。利用这些规律,可以建立复合词的物性角色分布序列,为同一语义类型复合词建构统一的释义模版,进而改善已有的复合词释义。通过物性结构的分析,复合词的复杂语义可以为人们所理解。

特殊句式的研究主要在国内展开。李强(2016)指出在汉语供用句中,先前理解模式有一定的价值却存在一些问题。他主张从物性结构中物性角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供用句的句法语义性质,指出主语名词物性角色中的功用角色与供用句中的动词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供用句的“供给”义和“使用”义的生成也与功用角色相关。李强(2018)又从物性角色出发,探究汉语中动句成立的因素。他发现中动句旨在突显事物的属性特征对于动作行为或状态的促进作用,要求主语名词的物性角色与谓语成分在语义上具有共构性和关联性,只有满足该语义条件的中动句才能够成立。

此外,物性结构与物性角色还被用于其他学科领域,如语用学、翻译学等等。作为新兴的词汇本体理论,然而,作为一种新的理论,物性结构与物性角色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有关物性结构的研究大都局限在单语条件下,研究范围较小,其应用领域有待进一步扩展与完善。第二,物性结构理论主要用来讨论复合词的组成机理,对于词汇语义内涵的研究不够深入。

总的来说,生成词库理论中的物性结构主要强调词汇具有生成性,对词语的语义描写详尽而具体,

融入了与该词所指对象的百科知识,能够反映词语所指对象的相关性质。物性结构对词汇语义的描写尤其对名词的语义描写,具有极强的适应性。通过文本中物性结构的构建,理雅格对于“仁”字内涵的理解得到厘清,词汇本体语义得到体现。

三、“仁”字的物性结构与物性角色分布

理雅格(Legge)是近代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也是第一个系统研究并翻译古代经典的外国学者。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间,理雅格翻译了多部中国典籍,他的译文被西方称作为了解中国最标准的译文。本节首先明确限定了理雅格译本中的研究对象,并构建物性结构,罗列物性角色分布情况,以此分析理雅格对于“仁”的识解。

(一)对象选取

在英译《论语》中,理雅格用了几种不同的方法来翻译“仁”这一核心词汇,比如 virtue, virtuous, benevolent action 和 the excellence。根据统计, benevolent action 在理氏的译文中出现了14次,而 the excellence 只出现了一次。除了“仁”以外,理雅格有时还会将“德”“贤”翻译为 virtue 和 virtuous。先前,人们大都会认为理雅格用 perfect virtue 来翻译“仁”。这样的理解自然无可厚非。而根据吴国向、袁毓林(2017)对于 perfect virtue 的物性结构分析, virtue 才是汉语“仁”对应的本词汇体, perfect 只是 virtue 的评价角色。 virtue 和 virtuous 是同源词,而考察 virtue 这一英语名词,更符合物性结构的特点。因此,理氏译文中 virtue 被选取作为研究对象。

(二)物性角色在 virtue (仁) 中的分布

在理雅格的译本中, virtue 共出现了111次。正如上文所述,除了将“仁”译为 virtue 外,理雅格有时还会将“德”“贤”翻译为 virtue。例如:

(1) 为政以德

wéi_zhèng_yǐ_dé

He who exercises government by means of his virtue may be compared to the north polar star.

(2) 贤哉回也

xián_zāi_huí_yě

Admirable indeed was the virtue of Hui.

虽然“virtue”有时并不与原文中的“仁”完全对应,但其所表达的“德”和“贤”是孔子“仁”的思想的具体体现,它们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仁”包括了“德”和“贤”。因此,在研究时,这些情况没有剔除,而是把它们全部统计在内。

表1 物性角色在 virtue (仁) 中的分布

物性角色	数量	百分比
评价角色	35	31.5%
处置角色	23	20.7%
形式角色	21	18.9%
构成角色	17	15.3%
定位角色	11	9.9%
施成角色	3	2.7%
行为角色	1	0.9%

其物性结构构建如下:

Virtue: 仁(德、贤)

评价角色: perfect, complete, true, superior, great, leaving, more, single, real;

处置角色: desire, abandon, act, love, practice, think of, exalt, help, know, injure, lose, preserve, comfort, consider, cultivate, hold fast, confound;

形式角色: his, people, Hui, man, student, our, other, house of Chau, thing;

构成角色: art, without, art, appearance, devoid, esteemer, practice, course, possessing;

定位角色: by, to, in, on, at, of;

施成角色: be, produce, degenerate;

行为角色: prevail;

如表1所示,在理氏译文中,我们发现 virtue 的物性角色共有七种,分别包括,评价角色、处置角色、形式角色、构成角色、定位角色、施成角色和行为角色。其中,形式角色出现的次数最多,达到35次,占总数的31.5%,处置角色出现23次,占20.7%。形式角色和构成角色列第三和第四位,分别占总数的18.9%和15.3%。出现次数最少的三种物性角色是定位角色、施成角色和行为角色,它们所占的比例均不足总数的10%。

通常情况下,在一个词汇本体的物性结构中,形式角色的次数应该较多,因为形式角色能在一个更大的领域中辨认出一个物体的基础范畴,它描写

物体在更大的认知域中区别于其他物体的属性（袁毓林，2014）。王恩旭，袁毓林（2018）在对“颜+名”的复合词的研究中也发现，无论在人造类、自然类还是抽象类的复合词中，形式角色所占的比重都是最大的。然而，在理氏文本中，形式角色仅列第三位，少于评价角色与处置角色。这一现象表明，理雅格没有花费很多的精力去识解“仁”的形式因素，即“仁”具体是什么

与形式角色不同，评价角色是对名词所指事物的主观判断，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评价色彩有“褒义、积极、中性、消极、贬义”5种（袁毓林，2014：38）。评价角色能最准确的反应理雅格对待儒家哲学“仁”的态度。考察理雅格对于“仁”的翻译，我们发现理雅格并不在“仁”字是什么，即形式角色上花很大的力气，而是倾向于用评价角色表达自己对“仁”的主观印象。

表2 virtue（仁）评价角色分布

评价角色	数量	百分比
perfect	22	62.86%
complete	2	5.71%
enough	2	5.71%
superior	2	5.71%
real	2	5.71%
single	1	2.86%
great	1	2.86%
true	1	2.86%
small	1	2.86%
leaving	1	2.86%

如表2所示，深入考辨 virtue 的评价角色，我们发现在35个评价角色中，single, great, true, small 和 leaving 分别出现1次，而剩余的都是如 perfect, complete, enough, superior 和 real 之类极具褒扬意味的形容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评价角色 perfect 出现了22次，占总数的62.86%。根据 Cambridge Dictionary 的解释，perfect 表示“complete and correct in every way, of the best possible type or without fault”。由此可见，在理雅格的眼中，“仁”是“no fault”的，即是“无过”的。因此，可以推断出，尽管理雅格并未对“仁”的形式与构成有深入的解读，但他对于儒家哲学这一核心思想的态度是积极的。

其次，处置角色占总数的20.7%，是出现第二

多的物性角色。处置角色描述人或事物对名词所指对象的惯常性动作、行为、影响。处置角色注重人和人词汇本体的关系，即人对词汇本体的操作和处理。在理雅格的译文，处置角色由一系列动词构成，如 desire, abandon, act, love, practice, think of, exalt, help 等等。这一系列动词为读者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如“亲仁”“里仁”“去仁”等等。这些处置角色为读者提供具体客观的行为指导。

此外，我们发现在理氏译文 virtue 的物性角色中，有三种物性角色并未出现。它们分别是：单位角色、材料角色和功用角色。单位角色和材料角色的缺失很容易理解。单位角色是名词所指事物的计量单位，而材料角色是创造事物所用的材料。古代汉语不使用量词，并且，孔子的“仁”是一种思想或者观念，创造“仁”的具体材料很难找到。但是，功用角色的缺失值得深思。功用角色描述的是名词的价值和用途。宋作艳（2016：45）指出，自然类与人造类的最大不同在于功用角色，功用角色是人造类的核心角色，其他角色都是为功用角色服务的。实际上，在 Pustejovsky 所提出的四种角色中，功用处于核心地位，构成和形式也是为功用服务的。物性结构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亚里士多德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目的因，目的因对应的就是功用角色。鉴于此，我们考察了《论语》原文中“仁”的功用角色：

仁：

功用角色：以为己任、能守之、不能守之。

孔子创造“仁”的目的是希望读书人以“仁”为责任，告诫统治者以“仁”治民，以“仁”治国。《论语》原文中“仁”的功用角色反映了“仁”的价值与作用。在理雅格的文本中，我们没有发现有关 virtue 的功用角色，这也说明了，虽然从评价角色来看，理雅格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是积极的，但他并没有明确地说明“仁”的价值。功用角色的缺失也直接反映了理雅格的双重身份：汉学家与传教士。作为汉学家，他可以表明对中国哲学认可和积极的态度，而作为传教士，他的任务是在遥远的东方宣传西方基督文明，而非在西方国家宣扬传统中国哲学的意义。

四、讨论：影响理氏 virtue 物性结构的因素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普遍认为：为了加强对

殖民地的统治，宗主国往往会改写，甚至扭曲殖民地文化。在翻译殖民地作品时，宗主国总是把殖民地文明看作“他者”，而灌输西方中心文化，改写“他者”是翻译活动最主要的目的。为了抵抗宗主国的控制，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译理论，例如巴西坎波斯兄弟的“食人主义翻译观”、尼兰贾纳的“破坏性翻译”等等（刘军平，2009）。然而，对于殖民地历史悠久、意义深远、影响巨大的文明，宗主国译者并不总是扭曲和批判。相反，有时宗主国译者会认同殖民地文明。

张萍，王宏（2018）考察了理雅格所翻译的三版《诗经》，他们发现在最初的版本中，理雅格对儒家思想带有狭隘的偏见。不过在之后的版本中，他不再围绕基督教来严厉批判中国文化及社会，而是慢慢认同儒家经典。通过对 virtue 的物性角色分析，我们也发现理雅格对待儒家思想的态度是积极的。理雅格（1871）之前曾说过，中国人对孔子“不仅是崇敬，简直就是顶礼膜拜”，而这种顶礼膜拜令统治者“混淆是非，去褒读 God，这是这个古老帝国的不幸”。我们发现，影响理雅格翻译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对孔子及其作品不断加深的认识；孔子思想的深刻内涵与价值；近代时局的要求。

之于孔子及其作品，理雅格首先是读者，然后再是译者，孔子“仁”的思想对他的认知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仁者爱人”是孔子对“仁”提纲挈领的表述，理雅格将其译为“*It is to love all men.*”。这里的“人”和“*men*”应该理解成于“己”和“*I*”相对应的他者。“爱他者”就意味着要关心其他人，为所有人创造福祉。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已经完全受西方列强的支配。作为宗主国的一员，他眼目睹了殖民地人的痛苦和无助，这显然于“*love all men*”不相吻合。因此，理雅格不再对孔子的思想进行批评和扭曲，而对其显出了宽容和认同。

以“仁”为核心的孔子儒家思想确实对于个体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着很大的启发。首先，“仁”为个人的发展设置了清晰的标准。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希望人们都成为恪守“仁”的“君子”。在成为“君子”的过程中，人们不断提高道德意识、社会意识、奉献意识。其次，对于统治者而言，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统

治者要“行恭”“行宽”“行信”“行敏”“行惠”。这能帮助统治者树立崇高的为政理念，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此外，在社会的发展上，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礼之用，和为贵”。这里的“和”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和”，更体现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这对社会发展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的时局混乱，外患内忧不断。在国外，西方列强和日本为了争夺在华的势力和地盘剑拔弩张。在国内，诸如义和团、太平天国之类抵抗外国势力的运动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对外国势力而言，要想获得最大的利益不光要加强政治、经济的控制，在文化上也要“恩威并施”。理雅格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积极的态度和正面的翻译体现了宗主国对于殖民地文化的认可和同情，这有利于宗主国赢得殖民地人的好感，进而获得更大的利益。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理雅格英译《论语》中“仁”字物性结构与物性角色分布的研究，发现理雅格译文中“仁”字的评价角色出现最多，且评价角色中基本都是正面评价。这说明理雅格对儒家传统思想持有积极的态度。但是，所有物性角色中并未出现功用角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理雅格汉学家与传教士的双重身份。作为汉学家，他可以表明对儒家哲学认可和积极的态度，而作为来华的传教士，他的任务是向中国宣传西方基督思想，带领中国人寻找另一个孔子，而不是向西方宣扬“仁”的意义与价值。

参考文献

- [1] Jackson F. Epiphenomenal Qualia [J].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982: 127-136.
- [2] Bruyn B L, Swart H D, Zwarts J. From HAVE to HAVE-verbs: Relations and incorporation [J]. Lingua, 2016: 49-68.
- [3] Legge B J. The Chinese classics [M].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 1970.
- [4] Legge J.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M]. Hong Kong: The Author's, 1871.

- [5] Pustejovsky J. The generative lexicon [J].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991: 409-441.
- [6] Pustejovsky J. The generative lexicon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 [7] Yumoto Y. Variation in N-V compound verbs in Japanese [J]. Lingua, 2010: 2388-2404.
- [8] 李强. 从物性角色看汉语供用句的句法语义特点 [J]. 语言科学, 2016 (3): 488-507.
- [9] 李强. 从生成词库论看认知转喻现象的语义解释 [J]. 中国语文, 2018 (2): 31-42.
- [10] 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 [11] 罗丹, 贾德江. 目的论观照下的《论语》中“仁”和“礼”的英译——基于两个译本的对比研究 [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 95-98.
- [12] 宋作艳. 功用义对名词词义与构词的影响——兼论功用义的语言价值与语言学价值 [J]. 中国语文, 2016 (1): 44-57.
- [13] 王恩旭, 袁毓林. 词义中物性角色的分布及其对词语释义的影响——以“颜色语素+名物语素”复合词为例 [J]. 外国语, 2018 (2): 31-41.
- [14] 王福祥, 徐庆利. 民族文化身份嬗变与古代典籍核心词汇翻译——以《论语》中的“仁”为例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3 (2): 98-102.
- [15] 吴国向, 袁毓林. 物性结构在文本中的创建及其翻译转换与衍化 [A]. 商务印书馆, 2017.
- [16] 杨平. 《论语》核心概念“仁”的英译分析 [J]. 外语与外语教学研究, 2008 (2): 61-63.
- [17] 袁毓林. 汉语名词物性结构的描写体系和运用案例 [J]. 当代语言学, 2014 (1): 31-48.
- [18] 张萍, 王宏. 从《诗经》三译本看理雅各宗教观的转变 [J]. 国际汉学, 2018 (2): 52-57.

The Distribution of Qualia Roles of “Ren” in Legge’s Translate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Xue Jiaqi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Abstract: Legge is a famous missionary in the west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Confucianism is worth exploring. With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ranslated by Legg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construct the qualia structure of the character “ren” which appears most frequently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qualia roles. The achieved results show that in Legge’s translated version, evaluation role takes the largest proportion and all of them are positive, which indicates that Legge shares some consensus with Chinese philosophy. However, the lack of telic role also reflects that the mission of Legge, a missionary, is to propagate western ideas in China. Additionally,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Legge’s attitude were studied with the hope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sinology research and enhance the applicability of qualia structure.

Key words: Legge; Qualia structure; Qualia role; Ren